

从批判走向治理

——托尼·贝内特研究

Tony Bennett

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是一位见解独特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

20世纪90年代初起，因他在文化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更加声名大振

在文化研究领域，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思路，并开辟了一条与他人侧重有所不同的研究方向(比如政策博物馆等问题)，偏离了文化研究的主流话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他的理论取向呈现出后期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但是，今天的汉学界关于他的汉语文献非常稀缺

对于他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远未形成气候。这也设定了论文的意义和使命

徐小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批判走向治理

——托尼·贝内特研究

Tony Bennett

徐小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批判走向治理: 托尼·贝内特研究 / 徐小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161 - 5098 - 6

I. ①从… II. ①徐… III. ①贝内特, T—文化研究 IV. ①G1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731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67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绪论	(4)
第一节 问题性阐述	(4)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8)
第三节 本书主要研究思路	(14)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28)
第二章 什么是文学:文本的使用和功能	(30)
第一节 对阿尔都塞学派文学本质主义的批判	(32)
第二节 文学本体空间的转移	(41)
第三节 阅读形构/互一文性	(50)
第四节 介入式文学批评政治	(59)
第三章 文学社会学的新维度:制度化的互一文动态场域	(78)
第一节 话语性的“社会”“历史”与“文学”	(80)
第二节 文学:制度化的互一文动态场域	(89)
第三节 审美与主体:作为自我技术的审美	(102)
第四节 文学政治:以制度政治消解意识形态政治	(116)
第四章 文化研究:治理性视角化	(128)
第一节 “治理性”与转向福柯	(131)
第二节 文化政策研究	(144)
第三节 文化与社会交往: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	(157)

2 从批判走向治理

第四节 政策改良主义的政治:策略性逆转的抵抗和 文化技术工	(171)
--	-------

第五章 博物馆研究:作为治理技术的博物馆	(188)
----------------------------	-------

第一节 文化机构实体的权力维度	(192)
-----------------------	-------

第二节 现代博物馆的治理技术	(198)
----------------------	-------

第三节 博物馆作为“市民实验室”	(208)
------------------------	-------

第六章 结语	(219)
--------------	-------

参考文献	(229)
------------	-------

导 言

托尼·贝内特是当代文化研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已成为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镇。随着国内文化研究热潮的不断升温，贝内特应邀两次来华访问，国内研究对其有了学术思想的译介和评析，但包括国外在内，迄今还没有系统深入的全面性研究成果。鉴于此，本书以贝内特所依托的文化研究、当代西方多元思想资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知识话语为背景参照，以其学术思想逻辑理路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为线索，对其学术思想的整体构形展开全面系统的阐述，以深入把握其重要的理论概念、思想观点和学术实践，评析贝内特学术思想和实践的突出贡献、重要地位和不足之处。

贝内特一生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术思想和实践涉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博物馆研究和社会学，在这些领域均享有世界性声誉，其理论观点和学术实践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和价值。笔者认为，贝内特学术思想的问题意识、形成、发展和变化主要基于他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自己身处的两大知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和当代文化研究中所存在的唯心主义进行的两次大的批判性修正，贝内特力图在两者内重新注入历史唯物主义活力，将对文学艺术、文化实践的历史性分析重新语境化。

在文学领域，贝内特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份发起形式主义与阿尔都塞学派间的对话关系，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审美理论方面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历史地、唯物主义地重新审视“什么是文学”这一根本性命题。同时，贝内特为规避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从对文本的社会性使用和功能效果的强调出发，将对文学的历史性思考从文学生产条件位移于阅读消费领域，在深层的学理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创立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论的、以阅读消费领域为主的、另一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

贝内特借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分析文学在阅读消费领域的历史性问题,提出“阅读形构/互一文性”(Reading Formation / Inter-textuality)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贝内特对文本在阅读消费领域中的社会性使用、功能效果的具体机制进行理论化说明,历史地分析文本社会性使用和功能变化的可能性条件,认为这些可能性条件是多元社会历史力量,力图挖掘社会各构成层面对“文本使用”的多元决定力。这一概念把“文学”视为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社会语境、文化意识形态等交融的互文动态网络,不但深化了对“文学”这一基本概念的认识,还实现了对文学阅读理论、互文性理论与英国文化研究受众研究方面的双重超越。随后,贝内特用“文学制度”概念进一步阐明制约文本社会性使用、功能效果变化的权力机制,尤其强调文学制度的机构实体这一物质层面所凝结的权力机制。在文学政治方面,贝内特从文本使用的功能、效果的角度出发,提出介入式文学批评政治和制度政治等颇具实用价值的文化政治理念。

20世纪80年代中叶,贝内特移居澳大利亚,他的学术兴趣也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受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实用主义学风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对当代文化研究基于语言符号学的文本唯心主义的不满,贝内特将自己以前对“文学制度”的思考进一步拓展到文化研究领域,率先提出“文化政策研究”(cultural policy study),敦促文化研究从仅关注意指实践范畴的唯心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文化政策研究主要关注文化实践的制度性背景和政策、制度机制的运作方式而非文化形式的意指实践,它的理论基础是福柯的“治理性”概念(governmentality),从更为积极的角度看待权力的能动性和生产性。贝内特把“治理性”引入文化研究领域,视文化、文学艺术、审美为自我技术,不但为文化研究的权力分析提供了不同于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新理论范式,还开拓了与文化研究批判性传统不同的实用主义方向。

贝内特对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的革新势必会引起文化研究某些理论范畴和基本架构的结构性转换,他从治理性角度对文化研究的整体范畴进行了理论重构:包括从治理性视角对“文化”概念的重新界定、重构文化与社会交往(the social)间的关系、指认文化知识分子为文化技术工、提出文化政治抵抗是治理性权力的策略性逆转,等等。这些重构除以福柯的治理性为理论基础外,还吸收了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

论,提出“聚合中的文化”(Assembling Culture)这一概念,视“文化”“社会交往”为话语与非话语、人类与非人类等异质因素相聚合而形成的动态网络和过程,从生成过程而非结果,重构“文化”“社会交往”的概念和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把握文化实践、知识和权力三者间的复杂关联性。贝内特的上述努力可看做他从历史和唯物主义角度,针对当代文化研究存在的文本唯心主义征候提出的治疗方案,用贝内特自己的话说就是使文化转向后的文化研究重回物质方向。

由于对文化政策、制度等权力机制运作的物质层面——机构实体的强调,贝内特十分关注凝结在机构实体上的权力和其运作方式,这一点借鉴了福柯的“权力装置”概念。贝内特对内在于机构实体的权力实践、知识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博物馆这一经验分析领域。贝内特的博物馆研究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不是从葛兰西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与霸权理论角度把握博物馆这一文化机构的,而是视现代博物馆为治理装置,指出它是现代市民的自我技术:由于博物馆内的各种知识实践具有某种动力效应,促使个体在身体践行和思想感情诸方面进行自我改变和塑形,进而改变社会关系,达到社会性治理的需求和目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现代博物馆也是改造市民的“市民实验室”(civic laboratories)。

贝内特的学术研究不但重视学理性和理论性,还注重操作层面的经验分析与个案研究,广采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统计学等实证性方法来研究通俗文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审美问题,分析文化政策、文化资本与文化区隔的关系等。

总之,贝内特从考察文学文本的社会性使用和功能变化入手,在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一根本性命题上,将对文学的历史性思考置于阅读消费领域,提出阅读形构/互一文本概念,以说明文学文本功能效果变化的社会历史动因,随后他进一步将这一社会历史动因归结为权力机制:文学制度。在福柯的治理性启发下,贝内特把文学(文化)制度的权力形式指认为治理性,并以之为理论基础,重构了文化研究的整体范畴。贝内特的博物馆研究,则是他将文化治理性的理论观点用于经验性分析的有益尝试。

贝内特在继承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同时,在对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机制等关系的复杂性的揭示上,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思考和理论价值,其学术思想中鲜明的理论开拓性、实践参照性、政治实用性,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性阐述

托尼·贝内特 [Tony Bennett, 又译为“托尼·本尼特”, 全名弗雷德里克·安东尼·贝内特 (Frederick Anthony Bennett)], 是继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之后, 第二代英国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贝内特也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 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贝内特的学术思想在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博物馆研究等领域都具有开拓性创新: 在文学研究领域, 贝内特为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美学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 在文化研究领域, 贝内特开创了新的理论范式——文化治理性; 在博物馆研究上, 贝内特打破文化批判传统视博物馆为市民社会一部分的思路, 从治理权力装置角度出发, 历史性地理解博物馆与权力、博物馆与主体、与社会行为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 奠基了当代博物馆研究以治理性为参照依据的新研究路径。可以说, 贝内特在上述三个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 他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贝内特 1947 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 在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 后在苏塞克斯大学 (Sussex University) 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兴趣集中在艺术和文学社会学上, 尤其对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十分关注, 这为他以后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角度切入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域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初, 贝内特在布里斯托尔大学 (University of Bristol) 工作, 与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等人结识, 开始了自己的文化研究学术生涯。1976—1983 年

担任开放大学社会学助教、跨文化研究课程讲师，出版了第一部成名之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本书围绕“什么是文学”这一基础性话题，对阿尔都塞学派的本质主义予以擘肌分理的分析和批判。凭借此书，贝内特在西方马克思文艺美学界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1983年，贝内特移居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格里菲思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先后讲授社会学课程和文化研究课程，后荣任格里菲思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政策中心”主任。受澳大利亚实用主义学风的影响和澳大利亚工党的政策性支持，在澳期间，贝内特学术思想的理论支撑也从葛兰西的霸权范式转向福柯的治理性，研究重心由文学审美研究领域逐渐深入文化研究领域，尤其侧重博物馆研究和文化政策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专著和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如《邦德及其超越》（1987，与珍妮·沃考特合著）、《文学之外》（1990）、《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政治》（1995）、《文化：一门改革者的科学》（1998）、《文本、读者、阅读形构》（1983）、《将政策置于文化研究中》（1992）等。1998年后，贝内特返回英国，在开放大学接任斯图亚特·霍尔退休后的社会学教授一职，同时担任开放大学“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至今，贝内特任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研究员、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墨尔本大学客座研究员。

自20世纪90年代始，贝内特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向文化研究，尤其侧重文化政策研究。他先后承担英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理事会等组织的多个重要研究项目，如他所领导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RESRC）是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资助的大型国际性研究；文化多元性与文化政策研究是欧洲理事会资助的国际项目。重要研究成果有《差异多元性：文化政策和文化多元性跨越研究》（2001）、《澳大利亚的文化：政策、公众、规划》（2001）、《超越记忆过去：进化、博物馆、殖民主义》（2004）、《文化的轨迹：文化、社会、知识分子》（2007）、《文化、阶级、区隔》（2009）。此外还有编辑、与人合作的著作22部，以及大量学术论文。其中影响深远的著作有《解释趣味：澳大利亚日常生活文化》（1999，与人合作）、《当代文化和日常生活》（2004，贝内特主编）、《物质的权力：文化、历史与物质转向》（2010，编辑并参与写作）等。重要学术论文主要有《作用于社会交往：艺术、文化和治理》（2000）、《制作文化，改变社会：“文化研究”的视角》（2007）、

《审美、治理、文化》《聚合中的文化》（2009）、《考古学解剖：具体化的时间和文化管理》（2002）、《公民实验室：博物馆、文化实物和管理社会交往》（2005）、《文化的工作》（2007），等等。

贝内特兼收并蓄各家之言，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想，紧紧围绕文化（文学）与社会间的关系，在众声喧哗的“后学”思潮这一新历史语境下，始终探索一条如何历史性地重新认识文化（文学）现象的学术之路，先后提出了“阅读形构/互一文性”“制度化的‘文学’概念”“文化治理性”“文化政策研究”“聚合中的文化”等重要观点，其学术思想已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范式，正产生着世界性影响力。但迄今为止，贝内特仍是一个广为人知却鲜为人解的学术大家，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各执一词，难有定论。

在当代西方风起云涌的多元学术思潮中，贝内特总是能与各阶段的主流思潮保持着清醒的距离，彰显出卓尔不群的独立思想品格：他以最激进的姿态彻底击碎西方马克思文学传统中的总体性、普遍性、审美自律性等幻觉，追求文化（文学）的历史化和境遇化；他从社会学功能主义立场理解文化和文学现象，消解文本中心主义，转而强调文本的社会使用效果和功能价值，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在权力观上，他立足于福柯的治理性概念，彻底拒斥当代文化研究的新葛兰西主义霸权范式，揭示现代治理制度与文化实践、现代知识分子间的复杂关系。

贝内特的特立独行自然遭到人们的争论和非议，即使与贝内特同样具有马克思主义学术背景的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对贝内特也颇有微词。伊格尔顿曾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含蓄地讥讽贝内特是典型的“左翼极端境遇主义”；詹姆逊则直言不讳地斥责贝内特，认为贝内特的思想“属于他体思想，他忙于以传统的阿尔都塞式的气势汹汹的恐吓方式，追踪和谴责所有这些左派方面的敌人的意识形态错误”^①。在文化研究领域，对贝内特提出的文化政策更是议论纷纷，质疑者普遍认为治理性视角下的文化研究丧失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价值诉求和真理批判维度。

笔者认为，由于各人的理论旨趣和立场观点之差异，对贝内特的批评指责难免有偏执一隅之嫌，在既未全面理解贝内特的整体思想框架，又无视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情况下，对贝内特这种断章取义式的指责是不公平

^① Fredric Jameson, "On 'Cultural Studies'," *Social Text*, No. 34 (1993), p. 29.

的。事实上,贝内特的学术研究一向成就斐然:20世纪70年代末,贝内特就以《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本不足两百页的著作,敲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厚重大门,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展开了与形式主义的有效对话,轰动西方英语国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界。80年代初,贝内特在开放大学发起“通俗文化”课程,首次站在读者立场,以葛兰西霸权概念对英国文化研究范式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予以调解,在英国文化研究中“这具有决定的、不同寻常的意义”^①。90年代左右,贝内特作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主要引领者之一,在澳大利亚率先发起席卷全球性质的文化政策研究这一学术运动,开拓了当代文化研究的实用主义方向,为促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取得世界性的影响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90年代至今,贝内特在转向福柯之后,用自己建构的“文化治理性”理论范式着手关于博物馆的经验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为当代博物馆研究奠基了新的视野和思路。同时,文化研究中当下十分热门的文化公民权研究也与贝内特引领的文化治理性范式不无关系。可以说,贝内特的文化、文学研究,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经验现象的实践分析上,均功绩卓著,他的理论观点和学术实践,以独树一帜的实践性、实用性、经验性,“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②,他也继霍加特、霍尔、威廉斯等第一代文化研究奠基人之后成为享誉世界的新一代文化研究大家。

据贝内特目前任职的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资料,其著述已传播至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印度、希腊、日本、中国等地,并正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仅 Google 学术网和 JSTOR 学术论文网两个网站搜索的数目显示,目前引用、引证贝内特观点和理论的相关著述,不下千部。贝内特不仅对文化研究具有独特贡献,他的文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等文化的社会作用,对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和贡献”^③,为我们从社会功能角度思考文学审美和文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性视角。但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贝内特学术

① [英] 约翰·斯托里:《英国的文化研究》,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② 段吉方:《理论与经验:托尼·本尼特与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王杰:《才·本尼特:文化与社会·中译文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思想全面、系统的专题性研究，贝内特仍是一个广为人知却鲜为人解的学术大家，对他思想观点的误读误释比比皆是，断章取义地妄加赞誉或指责的现象也随处可见。

鉴于此，能对贝内特整体学术思想做一个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和评述，填补目前这一学术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前沿性的学术价值。贝内特的学术思想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文学理论以及博物馆学，如能以跨学科视角深度解析贝内特的整体学术思想，对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博物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就国内语境而言，全面系统地研究贝内特的学术思想，在深度理解对方的基础上，与西方当代文化研究最新理论资源展开对话交流，积极借鉴、吸收对方的有益经验和资源，以问题式切入西方当代文化研究学术资源，对促进我国文化、文学研究工作进一步“生产性”地发展不无现实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虽引证、引述贝内特观点的论文、著作不下千部，但由于贝内特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文学、文化、政治、社会学、博物馆学、传媒研究等诸多领域，有关他的评论大多只是针对某一相关领域的散论和专评性论文，且寥寥可数，引论和散论居多，国外目前对贝内特的研究还未走向全面、系统。

就目前所收集到的评论资料看，从范围来说，主要集中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从评论倾向看，各评论观点意见完全冲突，赞同与批驳各掺半，即使针对贝内特的同一种思想观念，各评论观点也相互抵牾、意见相左。从书写形式来看，持赞同意见的文章虽居多数，但均为散论和引证，没有专评；持批评意见的均是专评，但为数不多。

具体而言，就评论内容看，批评者对贝内特的指责主要集中在“阅读形构”概念和“治理性”理论依据上，认为贝内特往往以偏概全，有将仅具一定适用限度的理论观点泛化的极端倾向。此类代表性评论文章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①《伊格尔顿采访录》《符号学唯心主义》

^① [英] G. 格雷厄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章建刚译，《哲学译丛》1998年第3期。

《官僚性》《在“文化的”社会中的公民权：一条国际主义路径》等。也有批评者指出，贝内特过于追求政治效果和达到效果的手段，存在一定的功能主义倾向，忽视了主体的意识情感和缺乏对伦理价值标准的设定。这一意见的代表性文章主要有《沃洛希诺夫、贝内特和政治书写》《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知识：托尼·贝内特和话语转向》《扩大的实践：审美、色情和文化研究》《普遍主义和乌托邦》《文化政策研究》等。

持赞同意见的基本都是散论，他们在肯定贝内特突出的理论贡献的同时，以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阐发贝内特的话语历史观、阅读形构、文类观、文化治理性等理论观点的适用性和合理性。此类代表文章主要有《评论：批评和社会行动》（*Review Essay Criticism and Social Action*, by James W Davidson）、《当代诗歌中的文学历史和反面实践问题》（*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Oppositional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Poetry*, by David Kellogg）、《上帝的游戏和治理性：〈文明2〉和超媒介知识》（*God Games and Governmentality Civilization II and Hypermediated Knowledge*, by Shawn Miklaucic）、《阅读形构的政治：以尼采在德帝国为例（1870—1919）》（*The Politics of Reading Formations: The Case of Nietzsche in Imperial Germany (1870-1919)*, by Geoff Waite）。

从评论范围看，文学方面（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最具代表性的专评是在贝内特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79）发表两年后，由安妮·蕾莉（Anne Reilly）和普鲁斯佩·罗塞兹（Prospero Saiz）共同撰写的30多页的专评《沃洛希诺夫、贝内特和政治书写》（*Volosinov, Bennett,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文章主要批评以贝内特为代表的英国左派文学研究在挪用俄国形式主义时，以自己的理论和政治立场先入为主地误读了俄国形式主义，致使俄国形式主义成为达到左派政治目的的材料和工具，却根本无视形式主义本来的真实面目和理论观点。文章用大量篇幅分析沃洛希诺夫^①的言语互动理论和贝内特对沃洛希诺夫的误读。作者指责贝内特移用沃洛希诺夫的目的只是使之更接近于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指出贝内特为达到对文本的政治再书写目的，“忽视了对话语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解”，这是功能主义和“历史主义

① 学界基本上公认署名为“沃洛希诺夫”的著作就是巴赫金的作品。

目的论”的行为。^① 笔者认为,安妮·蕾莉和普鲁斯佩·罗塞兹对贝内特存在的功能主义和目的论倾向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因为这的确是贝内特长达30年学术研究最主要的特点。可是,评者并未理解贝内特的移用和误读本身就是有意为之的后结构主义立场:文本的再书写重于文本的所指。可以说安妮·蕾莉和普鲁斯佩·罗塞兹与贝内特立场的抵牾,体现了80年代后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在“表征”和“现实”问题上的分歧。

同样的指责还见于基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知识:托尼·贝内特和话语转向》(Marxism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Tony Bennett and the Discursive Turn)一文。文章主要质疑贝内特《文学之外》(1990)一书的后结构主义立场。论者站在传统历史学家的角度,批评以贝内特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中解构主义相对论倾向,认为贝内特完全忽视了历史事实和真实世界,一味追求表征和语言的差异性,“丧失了意义的确定性,打破了符号与现实的必要联系”^②。结果使贝内特自己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由于丧失了历史的真实性和确定性,贝内特主张的政治理想的合理性依据也势必荡然无存。

如果说上述两篇评论集中体现了80年代学界关于“表征”与“现实”、“话语”和“世界”的争论,是现实主义传统对以贝内特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立场的责难的话,那么对贝内特80年代中后期建构的“阅读形构”的指责,则是文学内部研究视角的“文学自主论”与文化研究外部视角的文化多元决定论、境遇主义间的分歧。迪特·弗罗英德利布(Dieter Freundlieb)的《符号学唯心主义》和伊格尔顿《伊格尔顿访谈录》集中代表了这种意见。两位论者都指出贝内特过于强调历史情境主义的文本消费和文本使用效果,具有忽视文学生产论和文本审美价值的极端化倾向。

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评(90年代之后至今),主要对贝内特提议的文化治理性范式和文化政策研究仅以福柯哲学为理论基础提出质疑,认为文化治理性、文化政策研究仅依靠这一条理论路径,不但忽视了对主体能动性

^① Anne Reilly and Prospero Saiz, "Volosinov, Bennett,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utumn 1981), Vol. 22, No. 4, p. 543.

^② Keith Jenkins, "Marxism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Tony Bennett and the Discursive Tur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er. 3: 3: 1 (Spring 1994), pp. 16-28.

的关注,而且其明显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因缺失伦理价值标准的设定,极易沦为权力的帮凶。最典型的批评文章是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的《官僚性》(Bureamentality)和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的《文化政策研究》。乔纳森·斯特恩肯定以贝内特为代表的文化政策研究的确开辟了文化研究新的方向,但指出,文化政策研究仅以福柯的治理性为理论基础远远不够,还须补充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传统。作者通过分析贝内特的文化研究政策和文化治理性所依赖的理论依据存在的内在矛盾,即福柯治理性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间所存在的张力,尖锐地指出,福柯哲学自身存在的张力势必造成文化政策研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与其理论基础的矛盾,即政治改良的自由人道主义目标与反人文主义的权力哲学具有不可调和的张力,后者暗中颠覆了文化政策研究实践所指向的政治目的,结果造成理论和实践的分离,这种分离给文化政策研究留下了自身无法解决的伦理政治问题。

贝内特的文化治理性和文化政策研究由于悬置伦理判断和价值标准,也同样遭到吉姆·麦克盖根的质疑。在《文化政策研究》一文中,虽然吉姆·麦克盖根的主要目的是对以贝内特为代表的文化政策研究予以修正而不是抛弃,但文章还是指出了以贝内特为代表的右翼倾向的文化政策研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文章认为,以贝内特为代表的文化政策研究缺失对伦理价值标准的适当设定,没有在“实用真理”和“批评真理”间保持适当平衡^①,只一味偏重前者,批判性这一伦理价值维度却明显萎缩,使文化政策研究成为官僚权力的同谋,结果是,文化政策研究的政治实践以公民身份权这一社会民主改良修辞取代了文化研究传统的革命修辞。文章最后提出,要“自由地运用福柯和哈贝马斯洞见中的合适部分以阐释文化政策的特定问题”^②,建议用多视角的理论资源充实文化政策研究的上述缺憾。

二 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对贝内特的认识已从翻译介绍发展到研究性批评,但目前还没有

^① [英] 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政策研究》,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

^② 同上书,第197页。

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问世。

最早译介贝内特著述的是《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刊登的寿静心译的《科学、文学与意识形态——路易·阿尔都塞文学观念》一文，该文译自托尼·贝内特1982年伦敦版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第6章。此后，随着国内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和蔓延，贝内特的文化研究著述相继被译介引进。陶东风在1999年《文艺研究》第1期发表了《托尼·贝内特谈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一文。随后国内相继出现诸多译文。^①2007年，由南京大学文学院王杰、强东红等人以论文集的形式翻译出版了《本尼特：文化与社会》一书，该书选译了贝内特每个时期和每个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著述，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较系统译介贝内特著述的论文集。迄今，国内还没有关于贝内特专著的译作。

国内评论性论文的出现与2005年、2009年贝内特先后两次来华访问不无直接关系。2005年，贝内特应邀到北京语言大学访问和演讲，随后该校硕士生罗昔明于2006年写了《托尼·贝内特及其政治文化观念》硕士论文。这是国内首次关于贝内特的学术研究，也是迄今所有评论文章中较全面地介绍贝内特主要思想观点的论文。该文以贝内特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揭示为主线，介绍式地简述了贝内特的一些主要观点。本文仅就观点说观点，没有将贝内特的学术思想、学术实践与其所依托的思想资源、知识背景和现实语境联系起来，也未能把握其各观点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对贝内特主要观点的理解显得粗疏，甚至有个别的误读现象。

2009年，贝内特应以王杰为代表的南京大学官方的邀请来华，推动了国内学界对贝内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关注和研究热潮，王杰及其博士生先后发表了9篇论文，为国内贝内特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除此以外，有上海师范大学刘云茹、孙鹏程合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和罗昔明的《托尼·贝内特：从美学批判到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策与管制——托尼·贝内特的文化批评观念剖析》《托尼·贝内特文学批评观念剖析》等6篇论文，罗昔明的这些论文与其硕士论文内容基本雷同。

除了罗昔明这6篇论文外，目前国内研究贝内特的论文共计10篇，

^① 1999—2006年的具体译文名单介绍可参见北京语言大学罗昔明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托尼·贝内特及其政治文化观念》。